

##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进程中的 俄侨作家第二次创作浪潮

B. B. 阿格诺索夫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语文系, 俄罗斯 莫斯科 111402 )

**摘要:** 战后俄侨作家的创作迄今没有予以充分研究, 同时其创作方式与苏联国内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 他们所涉及的有关当时苏联国内生活的内容是国内作家所不敢问津的, 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着俄罗斯。本论文主要研究伊·叶拉金, 尼·莫尔森, 列·勒热夫斯基等俄侨作家的创作。

**关键词:** 伊万·叶拉金; 尼古拉·莫尔森; 列奥尼德·勒热夫斯基; 第二浪潮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识码:** A

60 年代初, 在美国的一次个人诗歌朗诵会上, 叶甫盖尼·叶甫图申克致词道: “你们为我鼓掌, 可是在你们中就有一位杰出的俄罗斯诗人伊万·叶拉金, 并且出席了今天的晚会。”他的这番话并无丝毫夸张。

在那些目前在自己的祖国仍鲜为人知的作家中<sup>1</sup>, 除了伊万·叶拉金之外, 还有诗人尼古拉·莫尔森、小说家列奥尼德·勒热夫斯基、巴利斯·菲利波夫、谢尔盖·马克西莫夫、帕利斯·希里亚耶夫、伊琳娜·萨布罗娃, 他们都对俄罗斯文学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在许多方面, 他们的创作走在了 60 年代新文学、甚至是改革时期文学的诗歌和小说的前面, 尽管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价。

早在 40 年代末期, 伊·叶拉金 (1918–1987) 就在慕尼黑出版了他的诗集《来自那方的途中》、《你—我的世纪》。在以后的年间, 又陆续出版了他的作品集《来自那方的途中》(1953 年新版)、《黑夜里的闪光》(1963 年)、《斜线飞行》(1967)、《屋顶上的龙》(1973 年)、《在斧头的星座下》(1976 年)、《在宇宙的大厅中》(1982 年)、《沉重的星辰》(1986 年)、《山丘》(1987 年诗人逝世后不久出版)。

叶拉金的小说和诗歌的基本主题囊括了艰难的生活感受, 漫长的战争道路, 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失去亲人的痛苦, 生与死, 自然与爱情, 艺术和艺术家的命运等等。在与康·西蒙诺夫、阿·苏尔科夫、阿·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悲怆的战争诗歌多方面遥相呼应的同时, 伊·叶拉金逐渐上升至对生存的悲剧予以存在主义思考的高度, 并 (在其晚期作品中) 克服了悲观主义的世界观。

在关于战争的描写中, 诗人并没有局限于描写毁灭的残酷、失去亲人的痛苦, 而是把战

争作为 20 世纪俄罗斯和整个遍体鳞伤的世界的悲剧予以思考（如《最后一个步兵已倒下……》等）。在这之后，诗人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了对被镇压的父亲和个人漂泊流浪的命运（长诗《星辰》）。

在美国的生活不可能不影响到伊·叶拉金的诗歌创作。诗人又一次拒绝接受周围的世界。只不过这一次取代隆隆爆炸声的是震耳的爵士乐，取代燃烧着的坦克和桥梁的是摩天大楼和大都市的灯火辉煌（《雨水踏着脚尖跑在街上……》、《在格林威治的村子里》）。这部作品集的名字《屋顶上的龙》本身就是对这一文明世界的概括写照：

Эти кубы, параллелепипеды	一座座高崇的立方体和平行六面形，
И углы, и бетонные плиты	街区的角落，钢骨的构型！
Тень! С тобой из орбиты мы выбиты,	影子呀！我与你一起迷失了方向，
Тень! В чужую орбиту мы вбиты.	影子呀！我们一起被卷入了陌生的旅程。

早在阿·沃兹涅先斯基之前，诗人就已经将自己比作为一部魔鬼机器上的小螺丝钉，随着这部机器被拖向了深渊。那里，笼罩的是一片空无，人类的正常情感早已荡然无存：

Послушай, я все скажу без утайки	我要告诉你，毫无任何隐匿，
Я жертва какой-то дьявольской шайки	我已经毁在一群魔鬼的手里。
Послушай, что-то во мне заменя	我要告诉你，我已被置换，
В меня вкрутили какие-то гайки,	一些螺母被拧入了我的肢体，
Что-то вмонтировали в меня	另有一些东西被装了进去。
И отключили от Божьего мира	我的心灵，我惟一的伴侣
Душу мою — моего пассажира.	已被强行与上帝的世界分离。

叶拉金不仅喜爱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以有助于表达世界的荒谬，生存的恐怖，并且创造出一种骚动不安的韵律，这一韵律为 60 年代新诗人们所运用自如：

Кругом какие-то темные шашки	到处是见不得人的阴谋——
Страшно!	可怕之极！
Заревом страшным окно	可怖的霞光染红了窗楣
Закрашено —	可怕之极！
И чегоя мытарюсь?	我为何要苦苦地折磨自己？
Пойду к нотариусу,	我要去公证人那里，
Постучу в дверь его	敲开他的门扉
Войду и скажу:	道出我的心意：
— Я хочу быть деревом!	我要成为一株树！
Я хочу. Чтоб было заверено,	千真万确，还要公证铭记，
Что такой-то — дерево	要成为这样的一株树

И отказался от человеческих прав.

所有人的权利我都要放弃。

应该指出，伊·叶拉金的“混沌中的灵感之作”中的场面同诗歌所表达的生活的力量交织在一起。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看到世界和生存的美好，善于在诗歌中描绘出街道、森林、白昼、时代的景色。在诗人的作品中，既有对印象主义的追求，又有画家马利亚温和库斯托季耶夫式色彩浓郁的描写（《我爱确定的颜色，纯红色的或纯绿色的……》）：月亮时而如“天空的弃儿”，时而如“桨楫上滴下的水珠”，时而如“绿色的弯刀横断穹窿”；雨后的水洼被比作是铅制的碗，而雨水则“踮着脚尖跑在街上”。

在美国生活的日子里，他几乎在每一首诗中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了基辅，回到莫斯科，回到祖国。他不止一次地谈到自己在美国生活的不合时宜性，以一个“译中人”自居，拒绝认为自己属于侨民文学。“我被称作侨民诗人，纯粹是一派胡言！”（《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胡说八道……》）对他来说，内心深处对祖国的眷恋是自然生成、有机存在的。他在《斧钺星座》中通过浓缩的“沉重的星辰”的形象表达了对祖国的忧虑和无法消除的故土之情《故土之情对我如此陌生……》。

在后来的诗集中，诗人最终寻找到了美以克服现代人的双重分裂的性格：“如今我为美失眠，就如我曾因思念而失眠”。逝世前他写下了一首由四句诗组成的短诗，并立遗嘱在死后将其发表：

Здесь чудо все: и люди и земля

这里的一切都那样神奇，人们和土地，

И звездное шуршание мгновений.

还有那瞬间星辰的窃窃私语。

И чудом только смерть назвать нельзя —

只有死亡未能独树一帜——

Нет в мире ничего обыкновенней.

在世界上它最平淡无奇。

一位继承了白银时代文学深邃的传统、悉力探索语言精微的内涵并开创了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先河的作家是 Н. 默尔森（1917-2001）。

默尔森认为，词语是将自然之音译成人类语言的媒介，它是开启通往永恒的芝麻之门的钥匙（“似懂非懂”意味着“莫名其妙”）。词语对诗人来说犹如奔腾的马群（《守在词典边》），是“重读音节的奔驰”和“抑扬音节的疾走”（《我像流浪者一样自由自在》），甚至晚霞在默尔森的诗歌中也“在天空中播洒着字符”（《晚霞》）。

通过对词语的潜心研究，默尔森在“似是而非”中找到了“是”，在“聒”字中找到了“耳朵”的含义，在“但得”中找到了“但丁”的字眼，他试图通过词语的辨析来解释自然的辩证法（《我悉心地研究词语……》、《部分和整体》）。诗人将人们熟悉的词语切分成音节，还其以最初的含义：свое-воле（刚一愆）；под-снежник（雪花一莲）；боли-голов（头痛一草，药芹）；чаро-действие（魔一法）；благо-даря（幸一得）；оче-видным（眼一见）等等。而当即使这样仍无法满足需要时，则自创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新的词语搭配：“не водопад — а водокап, не травостой — а траволяг”（不是瀑布—而是滴布，不是草群—而是草云）；“дух птицановый”（禽类精神）；“снежновости”（雪新性）；“снеголым-голо”（雪光的）；“на елочке снеговоздики, снеголочки”（雪针立在枞树上，雪头针）；“снеграфика, снеготика”（冰雪图表，冰雪哥特式）。

在 90 年代末期的诗歌中，诗人开始思索 21 世纪将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克隆的必要性问题。在为诗歌《进入 2000 年的哈姆雷特》所写的卷首词《信仰的象征》中，诗人阐述了这一问题，并用一种沉重的六音节抑扬格道出了自己的怀疑：

В тот день,	当那一天到来
Когда мы клонируем	我们将克隆
Мертворожденного младенца,	一个死婴，
Что это будет?	它的意义何在？
Рождение близнеца?	是另一个双胞胎？
Воскресение из мертвых?	还是死者的归来？
Первый шаг человека к бессмертию?	是人类通向永生的第一步？
Или: и то, и другое, и третье?	抑或什么都是？
На подступах к тому, что обещал Христос,	在走向基督许诺的目标时，
Пришла пора спросить в будущего века:	我们应该问一下未来的世纪：
Бессмертье или смерть — вот в этом весь вопрос;	永生抑或死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К чему иль ни к чему бессмертье человеку?	永生对人是否有意义？

俄罗斯战争题材小说离开了勒热夫斯基（1905<sup>2</sup>–1986）的长篇《处于两大星球之间》和波利斯·希里亚耶夫（1889–1959）中篇小说集《山雀》是无法想象的。

勒热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产生于中篇小说《来自地下掩体的姑娘》（1950–1951）。这部小说获得了布宁的高度赞赏，并且经改编后被冠以《处于两大星球之间》的书名，于1953年在纽约契诃夫出版社出版。然而在逝世前不久，作家彻底校订了小说，按着布宁生前对他提出的劝告，使小说的结构更为严谨、语言更为凝练。2000年，经作者最后一次校订的这部小说编入由我主编的勒热夫斯基一卷集，在俄罗斯出版。

勒热夫斯基的功绩在于他最大限度地客观地描写了战争的另一个侧面。这一侧面在过了很长的时期后，才由М. 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К. 沃罗比约夫的中篇小说《上帝啊 这就是我们》和В. 肖明的中篇小说《“Ост” 胸章》等引入到苏联文学中。勒热夫斯基着力描写了党卫军在战俘营中的暴戾恣睢的兽行场面。与此同时，作家展示了那些由于与德国权力机关合作而被依据当时苏联法律一律认为是投敌份子的俄罗斯人。他们是战俘营管理员科热夫尼科夫和普林克、医生卡姆斯基和莫塔林，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成千上万战俘的命运才稍有改善，并常常得以幸存下来。

作家倍加推崇的是那些心中充满了基督精神的主人公，他们对他人的恻隐之心不取决于后者的国籍、民族或其他别的什么。作家所钟爱的女主人公米丽察既同情被游击队员司徒潘打死的德国哨兵（“真可怜啊”），也同情一位被苏联政权枪毙的逃兵，后者被暴尸街头，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真可怜啊”，“不管怎么说，人都不应该横尸街头”——通过扎里亚日斯基的嘴道出了米丽察的心声）。米丽察明显地区分出毁伐墓地树木的“野蛮的德国人”和那些对俄罗斯人充满同情心的“正派的”德国人：爱里赫、库尔特、魏别尔、永远喝不醒的卡普斯特。无论是盖世太保的枪杀，还是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会所执行的枪决，米丽察都同样地无法接受。

“米丽察的话语中从来没有什么官方套语，她对一切都是在用心去评判。在扎里亚日斯基眼中，米丽察总是对的，从来没有任何生拉硬拽的结论”。

尽管作家偏爱于那些用心来评判生活中一切问题的主人公们，但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

作家所关注的是那些为俄罗斯永恒的主题所困扰、不断地徘徊于两大星球之间、在现实面前迟疑不决、徬徨失措的主人公们：“怎么办？以后该如何生活？”

“好吧，就算布尔什维克是敌人，但是在他本人——扎里亚日斯基和戈培尔之间又有什么同路可言呢？他们同路又能到什么时候呢？并且真的同路吗？怎么办？要想在这毫无意义的迷宫中找到出路，简直令人头疼之极。”——正是诸如此类的想法在不断地折磨着扎里亚日斯基。他当时主管着一个《转马》歌舞团，并且从属戈培尔的宣传部门管辖，尽管这种从属仅仅是形式上的。

“一面是白色的五角星，另一面是红色的五角星。红色带来的是死亡，而白色……”

这是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 Ф. Ф. 普林克的想法。在这里，省略号具有深刻的含义。

“世界已经到了可怕的危机关头，这就是两大体系间的直接对抗：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度……而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小人物则徘徊在两大星球之间”——书中的第三个主人公哥萨克人索莫夫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到。

早在符拉季米尔之前，勒热夫斯基就表明战争甚至能够在那些不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人身上产生爱国主义情感。在勒热夫斯基看来，入侵激起了俄罗斯人民的愤怒。随着德国人涌入俄罗斯，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敌意也随之俱增，爱国主义精神日趋高涨。勒热夫斯基通过对比德国军队前进中的混乱和俄罗斯式的静谧的斯塔罗戈洛特城的景象，娴熟地表现了这一内容：

“扎里亚日斯基久久地站在桥面上，桥从修道院的一方通向沟壑的另一岸。车轮经过铺着木板的桥面发出隆隆的声音，战靴上的铁钉在桥上铛铛作响，不时还响起异国语言的吆喝声。在柔和静谧的阳光下，这一切都显得杂乱不安。

古老的俄罗斯若隐若现于小城之中，它不是蛰伏在古老的建筑里，而是散现在纵横交错、数世纪以来就杂乱无章地建立在山岗和岸边坡地上的弯弯曲曲的街道中……”

实际上，正是这处于两个星球之间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和爱国者的悲剧命运，构成了勒热夫斯基小说的全部内容。作家从政治生命的角度看不到任何摆脱这一厄境的途径。而在个人的生活中，爱情（狭义的或广义的）则成为了惟一的出路。正如阿·托尔斯泰的小说《两姐妹》中的杰列金所说，“一切都将逝去，只有爱情永存”。又如布宁的主人公们，他们也是通过爱情克服了存在主义的死亡，哪怕这种克服仅仅是暂时的。同样，勒热夫斯基的主人公也是在爱情中领悟到了生存的最高意义。

希里亚耶夫的系列小说《山雀》（1952-1955）在俄罗斯战争题材小说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由 5 篇中篇小说组成：《最后一位老爷》、《雪暴万卡》、《羊水洼》、《库杰亚尔的橡树》和《霍隆日依·瓦库连克》（未完）。

同 K. 西蒙诺夫（《日日夜夜》）和 B. 涅克拉索夫（《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中》）一样，希里亚耶夫一方面继承了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的传统，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另一方面，又从同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在史诗中所表达的人民战争的观点出发，着重描写了俄罗斯军人爱好自由并最终决定了战争胜利的内在精神。根据希里亚耶夫的观点，战争不仅使人生的价值摆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并且当其具有了为祖国而战的属性之后，就能够将人们团结起来，使人们意识中的国家的思想提到了第一位。

同时，系列小说《山雀》也是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以及战后 10 年间所产生的一系列小说所进行的一场独具匠心的争论。后者努力要表明共产党在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希里亚耶夫看来，1917 年的骤变“动摇了俄罗斯国家的根基”，而布尔什维

克的政策使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失去了其民族特有的东正教的自我意识。

希里亚耶夫的主人公地主马斯洛夫（《最后一位老爷》）、他的孙女尼娜（《羊水洼》）和雪暴万卡（来自同名中篇小说和小说《库杰亚尔的橡树》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典型的俄罗斯人。他们高扬基督教人类之爱的真谛，探索在启蒙之路上。曾是盗马贼的雪暴万卡的形象尤为引人。在第一部中篇小说中，万卡就已经出现，并且在第四部小说《库杰亚尔的橡树》中走完了自己人生的路程。盗马对他来说只是一种表现赌博心理、勇敢和机智的方式。万卡并不想为自己从中谋取任何私利。卫国战争将他的能力引向了另一个方面。作家娴熟地运用了在文学中早已定型的关于大盗库杰亚尔的传说，展示了主人公心灵的复苏。正如我的研究生 Н. 杰米契娃在她的硕士论文中所指出的，“在《库杰亚尔的橡树》中，希里亚耶夫独特地解决了善与恶、罪恶与凶杀这一哲学问题……希里亚耶夫用暴力消灭罪恶的哲学思想与俄罗斯哲学家伊万·亚力山大洛维奇·伊里因的思想遥相呼应，其核心均是在为个人为了他人的幸福而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在这一样一种思考下的罪恶，最终将导致善行，因此作家认为是可以原谅的，并将为上帝所宽恕和接受”（Н.Дермичева 2002）。在系列小说《山雀》中，中篇小说《霍隆日依·瓦库连克》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在前几部小说中，作家对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还抱有势不两立的敌意，并因此处于社会对立阶级的立场上，那么，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则表达出了关于战争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阶级或社会的因素、而是民族因素的信念。贯穿于小说的一个思想是任何人都能够改变自己并走上履行个人天赋使命之路。因此可以认为希里亚耶夫的这—认识要先于格洛斯曼和弗拉季莫夫小说中的同一主题。

C. 马克西莫夫的创作同样表现出都市文学和流亡文学的相互复杂作用（常常带有相互斗争的性质）。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丹尼斯·布舒耶夫》（1949），该书已被译成德文、英文和西班牙文。这部小说与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第一卷有许多相似之处。从题材上说，这部小说同完成于 30 年代、当然也就无从为马克西莫夫所知悉的阿·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地槽》不谋而合。通过一系列的爱情的挫折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侦探性的关于姆思塔法·阿赫特洛娃的凶杀案的情节，作者展现了集体农庄主席阿利姆·阿赫特洛夫悲剧性的命运。他最初全心全意的相信集体化制度，后来又深深地对这一制度感到绝望，不愿再生活在谎言和恐惧中，最终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鲜明地表现了俄罗斯妇女玛涅法的民族性格，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从谢维里杨祖父到 40 岁的沉默寡语的格利莎·邦内赫等一系列俄罗斯人物的形象。然而，作者未能将言情小说同社会性小说的体裁有机地结合起来，与小说同名的主人公形象也显得平淡无奇。

C. 马克西莫夫的《丛林》中的 15 篇故事成为后来苏联“集中营文学”的先驱。这些短篇所描述的是古拉格制度，是搜捕、审讯和朋友之间的背叛的悲剧（《一个被捕者的故事》），是关于时代的种种恐怖。在这个时代，3000 人被赶进了一艘轮船的底仓，而在中转监狱的牢房里，107 名囚犯拥挤在规定不超过 25 人的监号中（《时代》）。还有那扼杀人性的工作（《钢琴家》、《第一百六十根路标》）。关于极端条件下人与兽之间的斗争的思考，构成了冲突的哲理性、戏剧性的基础。作者在《第一百六十根路标》中说道：“这里已经看不到人，有的只是野兽。”在故事《一夜》中，“原始森林在唱着它那可怕的安魂曲”，与此同时，乌尔克人正从太平间中的淫行里得到了满足。女主人公薇拉被迫与一个外号为“霍乱”的残忍的骗子“坏蛋”同居。回到家乡的女公爵，尽管想振作起来，但是一事无成。当她的母亲知道了她们得来的奶油、糖果和面包所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不禁号啕大哭（《女公爵》）。故事结尾这样写道：阴雨连绵，将灰蒙蒙的散发着土气的大地变成了一片泥泞。

“寒气袭人，在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是寒气袭人！”作者就这样结束了故事《一个过路的女人》。而故事《押解途中》的结尾是这样的：“浪花拍打着船舷，发出催眠般的响声。阴暗、潮湿、散发着令人窒息气味的船上一片沉重的酣睡声。人们的心中充满了凄凉和冷峭之感。”小说《在白雪的坟墓中》的结尾同样是阴森忧郁。不仅是那些乌尔克族的犯人们，甚至还包

括集中营的长官们，劳教管理人员们，都早已失去了人的面目。作者并非偶然地指出犯人懒鬼格利什卡与集中营长官亚可夫·莫罗兹同志之间的相似之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对那些“有文化的刽子手们”作了尤为恐怖的、然而又是十分逼真的心理描写（《捉狭》）。

尽管如此，从第一个故事《一个过路的女人》到最后一个故事《麻风病人》之间，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思想，这就是人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恐惧心理的克服。米奇卡一番则宁愿逃跑和死去，也不愿受屈辱和奴役（《钢琴家》）。饥饿的太平间看守，撇弃了厚颜无耻、好色的上司赐给的面包圈（《一夜》）。故事《麻风病人》中的主人公，宁愿选择抗争，也不愿俯就屈从，在刑满释放后甘愿去得罪当时的市委书记。

如果说 C. 马克西莫夫的基本叙事情节取材于古拉格囚犯们的日常生活，则 B. 菲利波夫（1905-1991）所注意的常常是一些戏剧性的、特别的事件，一些复杂的、鲜明的、自然形成的、来自于不同阶层和民族的典型人物。

在故事《小母鸡》中，在钻塔边的小房子里，聚集了“机械师巴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和集中营中心药房的工作人员，前考古学家维塔利，还有苏兹达尔来的阿尔西帕·谢尔盖耶维奇，内维尔的钟表匠……萨姆依尔·依萨科维奇·彼洛夫斯基以及狂热的世界语学家设计院的技师里查·塔杰乌舍维奇·茨维里斯基”，还有讲故事人安德列以及“老花母鸡玛夫拉和长着条斑的公猫帕姆瓦·别棱达”。他们在那里漫不经心地议论着爱自作主张的领导和总地质师——一个还不错的人，只是他最终也没有学会正确称呼自己的专业，而固执的将自己称为“地资”学家。在小说《无希腊人不是犹太人》中，作家将一个“因旷工和反苏维埃宗教宣传而被判处5年监禁”的楚科奇萨满，前公爵尼古拉·波里索维奇教授，格鲁吉亚老头瓦索·格里哥利耶维奇公爵，前近卫军军官尼古拉·巴普洛维奇，前共青团员谢辽莎·诺维茨基和被犯人们改名称做“瓦罐·谢莫弗雷奇”的亚美尼亚作家瓦岗·赫里斯托弗维奇等引到了一起。在故事《关于爱情、忠诚、死亡和其他一些浪漫的事物》中，作者给出了更多的人物形象。作家在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外部的主人公形象、描绘了他们的习性、举止言谈方式的同时，广泛运用了一些幽默性的词语和手段。

B. 菲里波夫的短篇的主题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均属一些老生常谈。一些善良的人们对两只无灵性的小动物——一只小母鸡和一只公猫产生了感情（《小母鸡》），另一些善良的邻居们则相互邀请，先是庆祝犹太人的复活节，后是庆祝东正教的复活节（《无希腊人不是犹太人》）。

每篇集中营故事的结尾都肯定了有关生命延续的思想。《小母鸡》的结尾是一位主人公在买了一顶由被关押的中国囚犯所做的猫皮帽子后，按照俄罗斯的方式为这只动物举行了葬礼。“参加这一葬礼的人大多是找到某种借口溜出来的”，而身兼肃反工作人员的“地资”学家则提醒其中的一位幸存者以后要多加小心。

菲里波夫的文学才华表现在作家对读者的抒情信告白中。这一文学形式在40年代并不常见，然而到了世纪末已为公众所普遍接受（《关于爱情……》）：“简直是乱七八糟！”——有教养的读者会气愤的说——“你甚至都无法确定这类东西属于什么题材，尊敬的文学副教授！要知道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乱七八糟！”

在以后的创作中，作家在小说《丛林》和《爱情》（1965）、《动机》（1970）、《一件快乐的事情》（1971）中又回到了集中营题材上。所有4部作品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炼，同时又保持了菲里波夫创作拿手的塑造复杂人物形象的特色，向读者表明了他对生活的祝福，将生活看做是通往善和爱的炼狱之路。因此，在他生前出版的《选集》（伦敦1984年）中这些故事被冠以一个统一的名称《荆棘而曲折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另外谈一下的是 И. 萨布洛娃（1907-1979）。作者不仅是国外文学界，而且是整个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惟一继承了白银时代童话叙事传统的一位作家(В.Агеносов, Д.Ващенко 2001: 261-26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尽管俄侨文学第二次浪潮没有上升到 И. 布宁和 И. 什梅廖夫那样的高度,但是它依然构成了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组成部分。战后俄侨作家为自己祖国生活的画卷进行了实质性的补充,而这些补充是苏维埃时代的作家力所不能为的。正是在这方面,俄侨作家们的创作得以超越了诸如 60 年代诗歌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改革时期文学和改革后期的文学。  
(郝斌 译)

#### 参考文献

[1]Елагин И.1998 Собр.соч.в 2 т..М.

[2]Дермичева Н.В. 2002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Б.Шеряева[D], М.

[3]Агеносов В.В. Ващенко Д.Н. 2001 Рецензия на перво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издание книги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J]//Новый журнал №223 Нью-Йорк.

## Literature of the Second Wave of Russian Emigr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ssian Cul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Vladimir Aguenossov

(Moscow Pedagogical State University , Moscow 111402, Russia)

**Abstract:** The creative activity of the writers of Russian emigration of the postwar era (1945-1950) is not studied enough. Meanwhile, by the way of artistic making the writers- emigrant of this period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literature of the parent states. In one sides, the writers of the second wave of emigrations have written about that side of the life in USSR, about which soviet writer was forbidden speak.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Russian patriots. This paper mainly talks about writers-emigrant like Ivan Elagin , Nikolay Morshen, Leonid Rzhevsky and so on.

**Key words:** Ivan Elagin ; Nikolay Morshen; Leonid Rzhevsky ; the Second Wave

收稿日期: 2002-09-06

作者简介: В.阿格诺索夫(1942-),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刘锐]

---

<sup>1</sup>仅仅在不久前在俄罗斯出版了以下的著作: Б. 希里亚耶夫的《永不熄灭的神灯》(莫斯科, 1991); И. 耶拉金的两卷本全集(编辑、前言作者为 Е. В. 维特克斯基, 莫斯科, 1998); Н. 莫尔森的《基于失去自由》(前言作者为 В. 阿格诺索夫, 莫斯科, 2001); Л. 勒热夫斯基的《处于两大星球之间——长篇、中篇、



---

短篇》（前言作者为 B. 辛科维奇，莫斯科，2000）；伊丽娜·萨布洛娃的《红塔王国》（前言作者为 B. 辛科维奇，莫斯科，2000）。

<sup>2</sup>语文学副博士 A. A. 科诺瓦洛夫根据文献资料确定勒热夫斯基实际出生年为 1904 年，而作家本人则一直认为是 1905 年。